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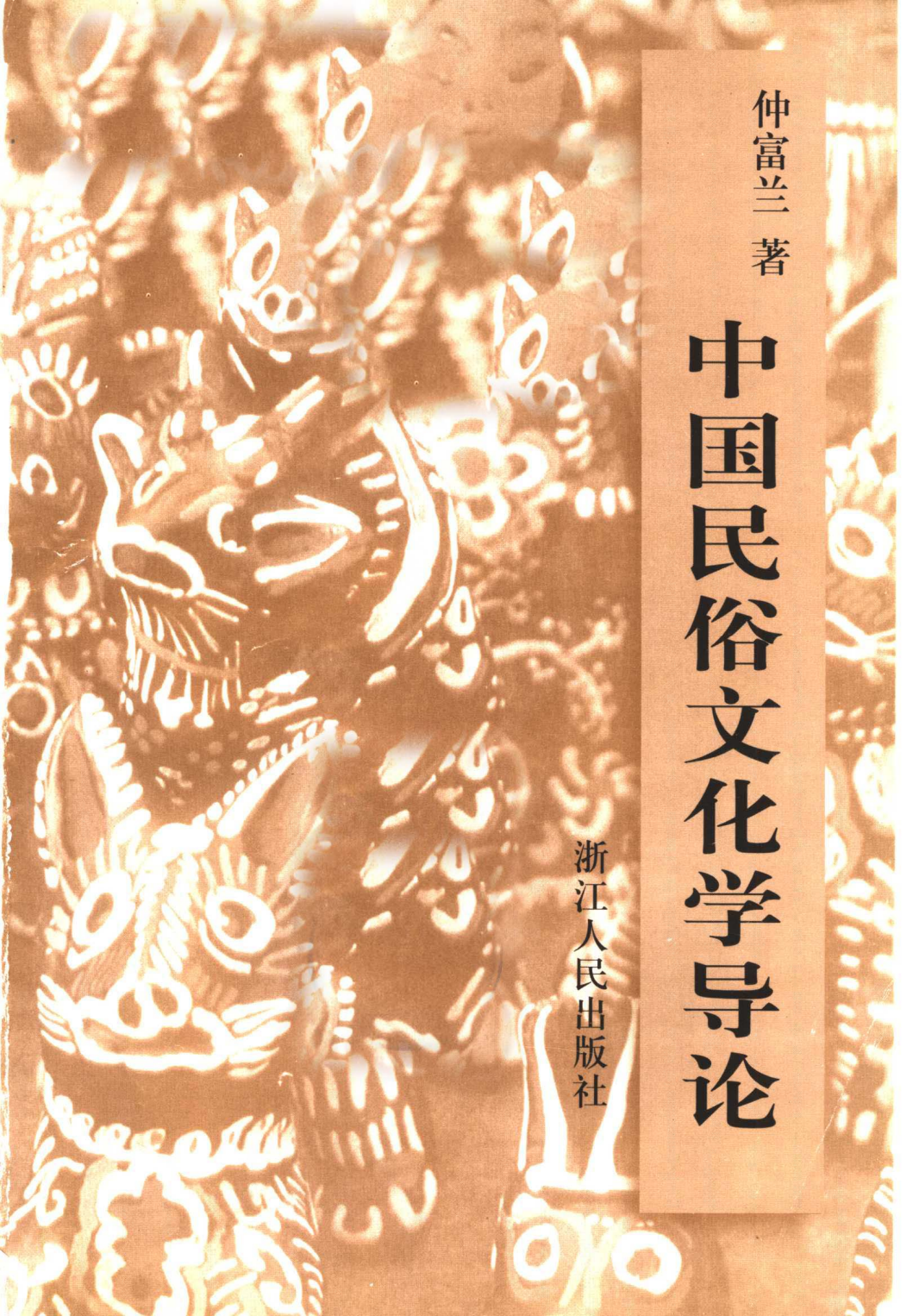


中国

民俗文化学

导论

仲富兰 著



仲富兰 著

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宁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校对：张振华

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

仲富兰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电厂路谢村)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2.625 插页 5 字数 55.5 万 印数 1-1000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3-01726-8/G · 447

定价：40.00 元

序

朱介凡

富兰老弟自 1986 年发表《开拓民俗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重构中国民俗学、建立民俗文化学新学科的主张以来，10 余年来，他潜思力学，念兹在兹。这两年，在忙碌的工作与繁杂的大上海社会生活，闹中取静，矢志用力，写下这部 50 余万言的大著，非有十分定力与乎高度为学热忱，秉持着深有所见的学养，曷克致此。

富兰老弟，是生长在徐家汇的上海人。为此学术论著的生活背景，显然比之前此 30 年代的好些学者、作家，局处亭子间，振笔急书，煮字疗饥的景况，大有不同。书斋表册籍资料既宏富得少人所及，这些年的田野调查，采风南北四方；而况他既是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的领导人，又主持了《民俗文化研究通信》的编行。有了这些前人不易秉持的凭借，乃使此书体大思精，剖析平允，深微而弘厚，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境界，是 10 年前的仲富兰所达不到的治学水准。

导论其书，分自相关各方面，提出不少宏观、微观交会的观点与方法。有如剥笋样的层层分析其理道，又似蜘蛛结网的紧密编缀，把古今中外的相关论证，都一一讨论到了。这是著者 10 年思考所亟求论证的主体。

从本书章节目录考察，略略浏览，可以认定，这不是一部太容易阅读的书。与 20 年前、40 年前的中国民俗学论著比较，必然同

意我的评品，朱某并未对此导论，多有溢美。

这是一部中国民俗学划时代性的论著。

本书令人激赏的论点颇多，在民俗事象中，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是在什么样的观念意识的驱动下，产生种种行为的方式的。作者以平实的态度，对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民俗学研究，再度升温，作一总结，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试图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民俗不是个别人的随心所欲，而是全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的文化过程中，进行选择的结果。它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又对社会生活进行制约的力量。”“民俗并不是法，它在人民生活中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社会生活中，这种无形的东西，对人们的约束力和威慑力，并不在法律之下。”“民俗不是法，但它是一种‘俗理’，与‘法理’相对应，无声地调节着生活中的各种事象和问题，同样是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的一部分。”“民俗又并非静止的‘死水一潭’。它是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一泓清泉’，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俗文化也在受到时间、空间和其他一些社会条件的制约”，……导论中“融会古今与贯通现实”、“高扬中国气派”的论点，以及用“民生、民事、民气、民艺、民智”来作为民俗文化的五大部类，这些论点，是应当强调的特色。

第十章第三节“源远流长的价值学说”——原始价值观、文化核心论、易经术数学、中和方圆说，第四节“民俗文化的价值坐标”——生生不息，革故鼎新，不变求变，追寻真理，极见著者深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亟亟求其发扬光大，好教我读毕全书，为之喝彩不已。

不论大题目、小问题，著者均能提出许多层次的分析，亏他把古今中外的的事象与论点，都征引到了，非博闻强记、慎思明辨的念兹在兹，曷克致此。

须付予商榷的一两处，也当提提。一是对中国民俗学初期的开拓，述说嫌不足。二是总结前此中国民俗学的业绩，似当列举

其 70 年来重要的书刊，并为简扼地提要说明、导论书末，似应列举参考书目。既为划时代的论著，编纂索引，也是很必要的。

导论所述，已很透彻，但还意犹未尽，盼望很快的，看到仲老弟有新的论著的刊出，以接纳国际民俗学中外士林君子的高度赞许。

1996 年 9 月 20 日 台北

叙 论

民俗文化学是一门以民俗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民俗，亦即民众日常的风俗习惯，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从时间上看，民俗是人类社会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从空间上看，不论是往日处于落后、蒙昧、野蛮的少数民族部落，还是今日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繁华都市，民俗都是它们重要的伴生物。它是人类文化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俗文化包含了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诸多民俗事象，以及由此产生和表现出的多种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民俗文化的主体是人，而人的本质又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要生存繁衍，进行各种生产活动，并在风俗习惯上衍生出多种文化现象，在它的表层表现为民俗的物化、行为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显形事象；它的深层则是人以及人组成的群体长期积淀而成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和观念模式。民俗文化学就是探索民俗文化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最一般的科学，它对于各种具体的民俗事象的研究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

现在，建设和发展民俗文化学的任务已经历史地提到了我们的面前。面对这个艰巨的任务，应该从多方面着手，诸如引进新的方法，制定研究规划，设立教学科研机构，促进专门人才培养，等等。但是，首要的问题，应当是解决这门学科的基础。我们好比是在建造一座高楼大厦，在此之前必须把基础打扎实。一门学科的基础，就是这门学科立足的根本。如果民俗文化学的基础问

题不解决，上述的种种努力将缺乏得以存在的前提和根据。

近年来，中国民俗学活动虽然呈现了十分热闹的情形。但是，对其学理的探讨，对其研究对象的历史，它的任务和范围，它的性质，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以及这门学科特有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似嫌不足。这不仅表现在从文化学的角度系统地、深入地阐释民俗文化的理论专著在海内外尚属空白，就是对民俗文化有严密表述的论著也不多见。这种状况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民俗文化学术事业是极不相称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我国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文化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一门与诸多学科交叉而又独树一帜的、面向人民生活的新兴学科——民俗文化学的应运而生，就十分必要了。民俗文化学的兴起与发展，必将给传统的民俗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带来蓬勃生机。这是一门大有可为的新兴学科，也是一条充满荆棘、需要付出艰辛劳动的艰难之路，让我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只顾耕耘，莫问收获，为民俗文化学的崛起和发展，作出我们的奉献。

第一节 民俗学的发生历程

民俗文化学，顾名思义，它应当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文化学科。但是由于我国近百年来独特的历史遭遇和学术发展的现实，民俗学一直是作为民间文学的一个分支。就是直到今天，一提起民俗学，许多人仍然把它作为民间文学的附属物。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同？这和民俗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及其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关。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今日之民俗文化学是从往昔的民俗学中走出来的，一切有志于民俗文化学的学子应当面对现实，继承前辈学者积累并馈赠给我们的遗产，对于民间文学界前辈们的辛勤劳动，理应表示莫大的敬意。他们毕竟在这块园地里辛勤

耕耘了大半个世纪。

为了使人们对民俗文化学有完整的了解和清晰的认识，在论述民俗文化学之前，必须对近代民俗学的发生历程以及中国民俗学的总体背景，作一个约略的鸟瞰和解析。更何况研究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了解它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它的历史渊源，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其理论观点的来龙去脉，了解它的研究对象、性质、作用以及发展前途。

虽然民俗与人类社会历史一样古老，但民俗学却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中外民俗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证明，民俗学是近代社会和思想的产物，它的发生和形成，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素质、思维方式、价值趋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应当将它置于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

英国一批从事古老知识与古物研究的学者，曾于1572年创立协会，并出版了一批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勃朗德的名著《民间古老风习的观察》。民俗学国际用语为Folklore，发端于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1846年，英国稽古学者威廉·汤姆斯以安布罗斯·默登的笔名，向《雅典娜神庙》杂志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用一个“挺不错的撒克逊语合成词——民俗”来取代像“民间古语”、“通俗文学”这样一些术语，并倡议研究这门学问。

汤姆斯第一次对民俗概念、性质、内容作了界定，如礼仪、风俗习惯、仪典、迷信、歌谣、寓言等，为世人所瞩目。英语中的Folklore早期含义是指民众的知识和学问，其后的内容显然与汤姆斯界定的内容有关。不过，在早期，英国、法国和德国，民俗学一词从来没有统一过。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族系的英美诸国，叫做“Folklore”（民俗学）；在拉丁语系的法、比、意、西、葡诸国叫做“Tradition Populaire”（民间传统）；在日耳曼族的德、奥等国叫做“Volkskunde”（民间学）；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挪威、瑞典、丹麦，又分别叫做“Folkemne”、“Folkmine”、

“Folkemind”等等。后来由于各国学者交流协商，特别是“国际民俗学会”的成立，Folklore 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有关这门学问的用语。

当然，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对民俗学的需要程度和研究状况，也表现出不平衡的情况。例如在德国，民俗学会虽然成立较晚，但德国学者对这门学科赋予了更为广阔和更为丰富的内涵，Volkskunde, Volk 指民族全体。德国民俗学的创立者里尔于 1858 年在《科学的民俗学》中，提倡民俗学是研究、交流德意志民族的学问。由于德国历史上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要实行资本主义，就必须使国家统一，而要统一，又首先必须寻找出本民族统一的民族精神。于是，研究赋予这个国家特定内容的民俗学，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任务。由此可见，一门学问的兴盛，总是和那个国家现实的需求紧密联系的。

早期民俗学与其他学科的发生一样，经历了一个发生、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开始是对原始蒙昧人进行研究，主要涉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崇拜仪典等，后来是对本民族（文明民族）的民俗进行研究，有的侧重于民间文学的发掘、研究和利用，有的侧重于环境地理与生态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思潮，如新人文主义、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等，都对民俗学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由于民俗学以提供丰富而生动的人类文化资料著称，所以也引来了多种学科各以自己的科学目标为立足点的各种学派。例如，中国著名民族、民俗学家杨成志教授列举的“民俗三大学派”——人文学派、人类学派、精神分析学派。人文学派其实是民俗学渊源于民间文学的鼻祖，它主要从文学和历史的角度开拓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派则是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检验民俗学的材料，其基本理论构成了今日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基石；精神分析学派的主旨不是文学性的，也不是如同人类学派那样强调功能，它强调的重点是心理因素支配下的行为模

式，著名的弗洛伊德是这个学说的奠基人。不同学派的相互攻难，各具分歧的观点、旨趣和准则，在民俗学的发生和发展史上，相互交叉、渗透、融会，后代学人可以感受到当时呈现出的那种学术研究十分恢宏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各国学者对于民俗学的研究，几乎都是从民间文学研究起步的，但他们并没有驻足不前，而是在研究观念和方法上层层出新，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由初期的总结到更广阔背景上的综合。早期人文学派的民俗研究，其实就是民间文学的研究，其理论背景是企图找出一个流动传播的学说，在各民族风俗中比较异同，追溯源流。相继而出现的人类学派，又通过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的分析，着重探寻人类整体行为及其与各种民俗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原因。此后，民俗学引进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更加重视从人的主观方面去解析各种心理状态下民俗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内容。当然，新的研究方法一个接着一个地兴起，并不意味着旧方法的寿终正寝，相反，诸种学说蜂起，形成学派林立的局面，对于民俗学的发展、繁荣和学科自身理论建设是有利的。近一二十年，特别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民俗学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

不论民俗学在当代如何发展，从文学到文化是基本的趋势。当今时代由于调查采集手段和技术的日新月异、民俗资料的积累迅速增加，分析水平也显著提高，它标志着人类思想在前进，这也意味着宏观研究民俗学和建设民俗文化学的时代已经到来。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对民俗学进行更大程度的综合和将其社会科学化的任务已经刻不容缓地放在每一位有志于这门学科的学者面前。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人类学和民俗学教授、美国民俗学协会主席阿兰·邓迪斯，在展望民俗学的研究前景时曾这样说道：“民俗资料以及研究这些资料的方法极为丰富多样。而它对民俗学教

学来说,又有着相当的妨碍。一方面,民俗必然与文学系相通,另一方面,它在其他方面又与社会学系有关系,这给我们审视教学中各个层次的细节带来了困难。把民俗学作为一门文学课程来学习的学生,倾向于将它看作文学研究的一种辅助训练;而把民俗学作为人类学课程来学习的学生,则以为民俗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然而,民俗学实际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如同语言学一样,尽管它在这所大学里开设在文学系里,在那所大学中开设在人类学系里,但它却构成了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要想掌握它,必须付出像其他任何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一样的努力。”^① 阿兰·邓迪斯先生对世界民俗学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尽管今日各国的学者对民俗学仍然有种种的界定和歧说,或偏重于文学,或借重于社会学或人类学,但这门学科实际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不同内涵和外延,因而孕育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流派。这种状况反映了民俗学光辉灿烂的前景。倘若在这个学科里始终是一个声音、一种观点,那将是十分可怕的。

第二节 中国民俗学评析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传统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周边乃至远东国家,以及南亚、东南亚各国及太平洋诸小岛国。源远流长的中国民俗,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宝库的宝贵奉献。

中国拥有民俗文化的丰富资源。在古代社会,它是作为“礼”文化的对应和补充而长期存在的。古代典籍对民俗有过许多定义和解释。《周礼》上说:“礼,履也。因人所践履,定其法式,大而婚冠丧祭,小而视听言动,皆有其节文也。”“俗者,习也,上

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礼，是古代社会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俗，则是老百姓的习俗和风气，古书上说“败常乱俗”，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②。班固在《汉书》中则进一步指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③古人对礼与俗、风与俗都作了精当的注解。

对于民俗的特点，我国历代学人都作过论述。如“入竟（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④。“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⑤“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⑥可见在古代社会，民俗就深深地打上了中国文化的印记，表现出明显的政治伦理倾向。

对于民俗的起源，阐述得比较全面、并注意综合分析者，当数晚清爱国学人，同时又是思想家和外交家的黄遵宪。他曾经这样写道：“天下万国之人，之心，之理，即已无不同，而稽其节文乃南辕北辙，乖隔歧异，不可合并，至于如此，盖各因其所以习以为之故也。礼也者，非从天降，非从地出，因人情而为之者也。人情者何，习惯是也。川岳分区，风气间阻，此因其所习，彼亦因其所习，日增月益，各行其道，习惯之久，至于一成不可易，而礼与俗，皆出于其中。……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而无物，察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然而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继，人与人相续，又踵而行之；及其至成，虽其极陋甚弊者，举国之人，习以为然。上智所不能察，大力所不能挽，严刑峻法所不能变。夫事有是有非，有美有恶，旁观者或一览而知之。而彼国称之为礼，沿之为俗，乃至举国之人，辗转沉溺于其中，而莫能少越，则习之圉人也大矣。”^⑦黄遵宪认为民俗是一种历史的因袭。它的形成，主要是不同地域的人民的生活习惯逐步发展而约

定俗成的，这种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一旦形成，并经传播，民俗也就形成了。

东汉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序言中说：“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⑧这句话可以看作是理解中国民俗的一把钥匙。中国历代统治者大抵都有重视风俗的传统，他们的“采风问俗”，为的是“治国化民”，整肃民风，统一纲纪，以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以，中国民俗有着强烈的伦理特点，我们在民俗文化研究中不应忽略。总之，古代的民俗与古代的礼制，是统治阶级手中的两把戒尺，正如黄遵宪所说：“是故，先王之治国化民，亦慎其所习而已矣。”“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故于习之善者导之，其可者因之，有弊者严禁以防之，败坏者设法以救之，秉国钧者其念之哉。”^⑨民俗与政治，看似殊异，其实关系密切，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古老的国度。对这个特点，本书在后面还要继续分析。

应当看到，也正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民俗传统的文明古国，历朝历代涉及到民俗的文字材料和典籍资料浩如烟海，口传的民间文学材料更是恒河沙数，从事民俗资料收集者也不乏其人。《礼记》中有“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⑩的记载，《汉书》上也有“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⑪。“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⑫《诗经》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民歌。在经史子集各个门类的图书中都蕴藏着丰富的民俗资料和信息。可是，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却从未产生过民俗学。即使像黄遵宪这样杰出的学者，对于民俗研究也不过是停留在“搜集文献，叙述风土”和终生“咨询故老，采风问俗”^⑬的水平上，他对于民俗的内容、特点，研究民俗的目的、态度、方法，贡献了较为系统的见解，但由于历史与社会条件的限制，黄遵宪在学术界喷发出的思想火花，没有也

不可能把学人引导到科学的民俗学中去。

科学的民俗学在中国的出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催产的结果。中国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在纪念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创立 60 周年的讲演中这样说道：“中国民俗学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伴随物。在那轰动世界的爱国运动发生的前一年（这时新文化浪潮已经在学界涌现），北京大学文科几位具有新思想的教授，在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下，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开始向全国征集近世歌谣。”¹⁴

不论学术界对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分期问题怎样地各抒己见，但把 1918 年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作为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端，却是各方一致的意见。一批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把学术研究的视野拓展到民间文艺领域，他们注重发掘和阐明“村歌俚谣在文艺上的位置”。1922 年北大创办了《歌谣周刊》；1923 年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凡此种说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序幕，是紧紧伴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揭开的。这一切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界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意识觉醒，一批关心民俗问题的学者和作家都把自己了解、研究、表现的对象转向了广阔的民间。

1927—1930 年，广州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在中国民俗学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时期。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广东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策源地。北方军阀的统治促使一批学者南来，导致 1927 年 11 月在中山大学成立了第一个以“民俗学”命名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广州成为民俗研究的新的中心。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的《民俗周刊》本着发扬平民文化的宗旨，鄙视封建主义旧文化。该刊的“发刊词”写道：

我们乘着时代的使命高声喊几句口号：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

认识整个的社会！

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

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

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

《民俗周刊》从1928年3月21日创刊到1933年6月13日止，出版123期。1936年9月15日复刊，改为16开本，不定期出版，1943年12月停刊。《民俗周刊》代表着一个时代，代表着30年代民俗学运动生机最为旺盛的全盛时代。

此后，由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的部分学者，分别到各地开展民俗学活动，除广东之外，福州、杭州、漳州、安徽、上海、天津、香港等地，都开展了民俗学活动，形成比前期更大的影响。1927—1937年，民俗学运动不仅扩大而且有风起云涌之势。可惜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人民面临国破家亡的惨祸，许多民俗学会和民俗刊物逐渐被迫停顿。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民俗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沉寂了30年，所幸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清算了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为我们国家经济、文化、科学、艺术事业的全面振兴带来了新的生机，特别是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民情风俗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象、新问题，对民俗生活中的许多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也需要给予合理的说明并加以引导，传统的文化、意识和观念受到了挑战。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也迫切地提出了移风易俗的任务。1979年以北京七位老教授的倡议为发端，又开始了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著名民俗学家萧亨先生在审视80年代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走向时指出：“近代民俗学的兴起和发展，总是同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同

人民大众的群体意识密切关联。民俗之与国运民心，有如晴雨表，可知天候；又如布谷之鸟，惯作催耕之鸣。”“它是一门由千家万户来共同确认取舍的学问，是同我们的时代走向相呼应的实践的科学。”^[1]这句话说得多好呀！

综上所述，中国民俗学在我国诞生的当初，首先面临的是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封建主义专制的国家，鸦片战争以来的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又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近代民族危机的刺激，首先唤起了一批先进的中国人的理论热情，促使他们向西方寻求真理。当时，许多先行者们提出了“民族的自觉”，主张对中华民族自身作深刻的反省。不少有识之士都十分重视改造国民性、刷新国民精神与道德对于振兴中华的意义。尽管旧民主主义革命悲壮地失败了，但全民族的觉醒毕竟提上了议事日程。“五四”运动前后，由于广大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社会政治、文化变革的需要，在科学与民主潮流的节拍声中，中国民俗学应运而生。然而，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中国民俗学，不能不产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第一，理论准备不足。中国早期的民俗学拓荒者们，一旦接触到西方涌入的民俗学，其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马上显示出来。其中自然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上的原因，客观上当时也没有一个相对稳定地进行理论思辨的环境。因为当时面对着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惨祸，使中国民俗学的先驱者们不可能像西方民俗学家们那样从容不迫地进行长期的理论准备工作。他们单个人的素质很可能是出类拔萃的，但在新思潮面前，不容他们细加思索，历史就催促着他们踏上征程了。从此，中国民俗学研究经历着坎坷曲折的道路，尽管条件简陋，资料匮乏，早期的拓荒者们还是筚路蓝缕，开拓前进，在民俗园地里辛勤耕耘，并进行了一定规模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整理工作，出现了像中山大学《民俗周刊》那样优秀的刊物，也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像